論姜貴小說的主題

Timothy A. Ross著
陳森譯

姜貴是一位中國小說家，自一九四八年起，即卜居於台灣。他生于一九〇八年，反映在他小說中的生活經驗包括：在一個式微的大地主家族中消度童年、在濟南和青島接受中學教育、參加北伐、在中日戰爭期中服務軍旅八年、遷居台灣以及生活窮困。雖然，就年齡而論，姜貴乃是一位跟諸如沈從文、巴金和張天翼等著名作家——他們在一九三〇年代就已卓著聲譽——同一時代的人，但他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後才在台灣開始認眞寫作。他的作品係受這一事實的影響：他所隸屬的那個社會業已永遠消失；而他的兩部最佳的長篇小說也的確是在專一闡釋那種瓦解的原因。另一方面，他的年齡與他的文學見解也使他跟台灣的年輕一代的作家隔離開來。

姜貴出生于慈禧太后去世的那一年。在他四歲時，他的伯父爲鎭壓革命黨人起義的清軍所殺。一九二七年，他目擊武漢的國共分裂；一九四〇年，他遍歷日軍的後方。他是他家族中逃離大陸的唯一成員。就他所親覩的歷史來說，時代與變遷、傳統與反傳統之成爲他主要的着眼點，原是不足爲奇的。

本文試圖陳述我對姜貴小說中的重要主題的看法：過去的重担、革命與孝道之辯以及對于革命各方面的批判。

過去的重擔

在一九三六年，姜貴極度關切他國家對于即將來臨的浩刼之毫無準備，便寫了一個名爲「突圍」的中篇小說。這部小說表達了夏志清教授所謂的「被中國所纏住」(Obsession with China)，「一個得了精神病的國家，因而也就無法自强或者改變它那固定的，違背人道的方式」【見夏氏所著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2n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533-534】。書中的主角林杜感到中國是在過去的重担下壓倒了。

他親自體驗到這一點，認爲它把各種機會都堵住了，當他想出一個隽句以便作成一首詩、隨又不得不把它放棄的時候，因爲他得知杜甫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用過同樣的句子。（姜貴也曾有過類似的經驗，斷言假如有中國舊詩的傳統的話，那就幾乎不可能寫出一個創新的句子來；那也許就是他轉向小說的一個原因。）此外，當林杜在一九三二年從南京前去洛陽時，他發見了中國的「過去」擋住它的「現在」的證據。他在洛陽的女房東依然堅要給她那個尖聲銳叫的女兒纏足。在久旱不雨時，他又看到當地的黨政重要人物在膜拜一尊土神——化身爲一條金色的小蛇——祈求天降甘霖。最糟的則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物的橫行霸道的作風以及弱者的孤立無助。被中國的落後情形所嚇呆，林杜自個兒喃喃地說：「我們一事無成，我們一事無成。」（見「突圍」，一九三九年世界書局出版，第八四頁。）

中國的家庭制度乃是姜貴的過去的重擔的主要象徵。當「旋風」中的共黨主角方祥千回到他的原籍方鎮時，基因于家庭制度的林林總總的悲慘情景便展開了。在方族的本宅中，老太太——那個女族長——折磨她先夫的姨太太。在另一個家裡，方八姑則以輕蔑的態度對待她的庶母，因爲那個女人是妾而不是八姑父親的明媒正娶的妻子。而在另外一個家裡，一個繼母的虐待把一個未出閣的前房女兒逼得發瘋而至於自殺。這些大戶人家的腐敗促使一個女人說：

「……我還沒有出閣的時候，聽說這鎮上方家大戶，多麼高的門第。誰想到他裡邊這樣烟污！像那冬天的

西瓜一樣，表皮雖還好，瓤子已經不行了。……」（見「旋風」，一九五九年明華書局出版，第一二五頁）

在另一部長篇小說「重陽」中，一個湖南商人爲他的兒子安排親事。劉先生所選中的媳婦是一戶歷代書香的人家的女兒，而爲了要贏得她長輩的應允，他只好送他們一筆厚禮。劉先生覺得他已訂下了一門理想的親事。可是他的兒子，他祇是勉强完婚的，認爲他的新娘是買來的，就待之如娼妓。這個年輕女人被她丈夫的輕視所屈辱，就設法自殺。劉先生是宣告失敗了：

> 悶坐了一回，老先生自覺對于管教孩子已經無能為力，任何言辭、任何方法，都不能使他們歸于正途。他一直不明白他們到底如何想法，而自己的想法好像也不能為他們所了解。他想，莫不年頭兒變了？三十年前，當他的少年時代，他覺得他並不和他的父親甚至祖父曾有什麼歧異，他們的想法、看法，往往一致。
>
> 現在呢，父子、兄弟、夫妻之間，都有了很大的距離，簡直沒有希望攏到一起來，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見「重陽」，一九六一年作品出版社出版，第七十八頁）

姜貴的小說世界中之最最迷戀過去的人物乃是耿自修和姚六華，長篇小說「碧海青天夜夜心」中的男、女主角。這部八四〇頁的長篇小說是篇詳盡的心理研究，臚述一個本質上未脫稚氣的年輕人爲了要扮演男子漢、大丈夫而作的努力。耿自修，一個富有而英俊的年輕人，首先被他意志剛强的母親所支配，而後又被他那意志更爲剛强的妻子所左右，于是就逃離上海，前往徐州，他希望在那裡能卓然自立。他在那裡邂逅了一個叫姚六華的妓女，她那柔順溫存的氣質恰巧跟他那個想在一種浪漫蒂克關係中充當一名較强的對手的願望相吻合。她成了他的情婦，這是徵得他妻子的同意的，因爲他的妻子實感到她的丈夫在離家以後是需要人照顧的。姚六華在她跟耿自修的關係中發現了一個擺脫她自己的不名譽的過去以及獲得尊敬與愛情的機會。耿自修，一個樂觀主義者，經常勸她忘却過去以及恢復自尊。可是那些醜陋的、使她憶起過去的事物却出來困擾姚六華，她的心頭經常縈繞着那則唐代娼妓的傳說，那個娼妓遭受到批評，因爲她沒有追隨她的情人于九泉之下。

戰爭給了這對情侶以一個短暫的、追求幸福的機

會。耿自修做了戰地記者，而且在他獨力走遍中國內地的時候獲得了自信。跟他同行的姚六華也很高興人們承認她是他的妻子。然而耿自修那種要與士兵共艱苦的浪漫味兒的强制力却導使他去作一種不必要的冒險，然後，他受了重傷。他一死，姚六華也就舉槍自殺了。

過去是不易消逝的（The past dies hard）。「旋風」在快結束時，共產革命來到了方鎮。曾爲這種革命賣力了二十年的方祥千頗具信心地期待着一個除盡過去種種不平等的新社會。當他的一些親戚、甚至共黨夥伴、被新黨當局處死時，他默認了下來。他高高興興地忍受着新政權下的物質上的貧乏。但是當私人關係——過去的重大特徵——的型態重新抬頭時，他就漸漸感到不安起來。許多對于革命不曾有過貢獻的自私自利的人經本地的共黨當局的一意孤行而躍居要津。一個獲得省委會代表青睞的老妓女被封爲「方鎮革命之母」。方祥千在看到革命被一些寡廉鮮恥的人所歪曲時，他變得絕望了。的確，方鎮的革命把社會搞得一團糟，而且使從前的那些落拓小人得了勢。但正跟以前沒有兩樣，那些善于適應的人以及肆無忌憚的人都能經由私人關係而攀登高位。無法接受他的期望與革命實況之間的差距，方祥千終于藉向本地的共黨當局挑戰——爲了「眞正的」共產革命——去決定他的命運。

革命與孝道之辯

雖然姜貴的若干人物爲過去的重担所控制，但另一些人物却對它反抗，並且追求不受束縛的自由，往往把人類的基本義務都犧牲了。在「突圍」中，還有，在「重陽」中，姜貴提出了這個問題：一種獻身于「大衆」的革命行爲是否可以免除一個人的行孝的義務。

汪晉支是「突圍」中的一個人物，一個漂亮却沒有頭腦的年輕色狼。一九三二年的某一天，他的朋友林杜得悉汪的老母——她在一家工廠裡工作多年去撫養她的兒子——在上海市的閘北被捕了，這時，日軍跟中國的第十九路軍正爲這個都市而戰。當林杜問汪爲什麼不設法營救他的母親時，汪溫和地回答說是在閘北受苦的不止他母親一個人，而且，不管怎樣，正

如汪所說的：

「現在是什麼時代？如今，這是一個大衆的問題。」（見「突圍」第二九頁）汪像這樣地乞靈于「大衆的問題」去卸脫嚴重違悖孝道的責任。

在「重陽」中，這一主題被以更多的篇幅提了出來。洪桐葉，一個在一九二六年邊巡于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年輕人，竭力使自己相信他一定得拋棄他在上海的那個害病而貧困的寡母，前去武漢參加革命。

「老人接近死亡，屬于過去的世界。我們年輕的一代，却有創造未來的責任。雙方是背道而馳的。」（見「重陽」第一一四頁）

後來，他把這一見解傳授給他的妹妹金鈴：

「她老了，做不動了。」

「那就活該沒有辦法。」洪桐葉搖搖頭，苦笑一下，「將來革命成功了，國家會有養老院。現在是青黃不接的轉變期，自然不免有許多小悲劇。」

「你說這是小悲劇？」

「是的，我們有更多的正在受難的無產者！」

「連自己的母親都不能照顧，我們還有資格設想那許多人的事嗎？」（見「重陽」第一三三頁）

在後來的一次談話中，金鈴譴責她的哥哥，因爲他不再照顧他們的母親。洪桐葉抗議：

「我怎地不要母親，我在為普天下的母親打出路！」

「不要說着玩了，你連自己母親的死活都不顧，你還關心別人的母親？」洪金鈴氣往上一撞，不哭了，「放着眼前的人你見死不救，你說你去救十萬八千里以外的人，你說你去救三千年以後的人。你是什麼心肝，你是人嗎？」（見「重陽」第一五〇—一五一頁）

我認爲這是金鈴在爲作者說話。姜貴顯然不是一個舊秩序的衞護者，但他也不立即排斥它的各方面。他的論點，稱它是儒教的也好，基督教的也好，或者單是人道主義的也好，乃是：對別人的迫切需要的關切一定得優先于對抽象事物的關切。獻身于某一理想的行爲並不使一個人免除通常的行爲標準。

對革命的批判

姜貴的最重要的兩部長篇小說「旋風」與「重陽」——是意圖作爲姊妹篇的——分別談到鄉村與都市

中的共黨革命。兩者都想說明那些引誘人們參加共黨的因素。兩部小說都生動地描繪了中華民國的分崩離析的社會，充滿着好色而貪婪的上流人士、娼妓、土匪、軍閥以及無依無靠受苦受難的小民。明顯地，這兩部小說所揭示的社會是亟需改變的。但呈現在書中的共產革命——這是姜貴所想加以闡釋的——却不是一種解救，而是一種達于絕頂的災禍。

在姜貴的小說中，哪一類人被吸引到共產主義的運動中？

方祥千是「旋風」的主角。當這部小說開始時，他是一個四十左右的知識分子，一個無師自通的共產黨徒，他似乎是被他對金錢以及金錢在社會上的重要性的憎恨心理所激發。縱使他對共產主義以及俄國革命的理論上的知識極爲淺薄，但他却知道中國需要某種不僅僅止于表面的政治改革的東西。一如他所說的：

「自從太平天國以來，我們什麼都試驗過了，都沒有效驗！我們祇有最新的也是最後的一條路了，那就是共產！」（見「旋風」第七三頁）

方祥千猜測共產主義，一旦實現，將會提供一個黃金時代。如他對他的遠房姪子所解釋的：

「俄國經過十月革命以後，社會革命成功了。大家做工、大家種田、大家吃飯、大家一律平等，大家都有自由。結婚自由，離婚自由。老婆不如心，馬上離掉，再換新的。國家設有育兒院，孩子養下來，往育兒院裡一送，你就不用管了，一點也不牽累你！病了，國家設有醫院，免費替你醫治。老了，國家有養老院，給你養老送終。總之，人家俄國是成功了。」（見「旋風」第一〇五頁）

作爲一個共產黨徒，方祥千贊同這個法則：但達目的，不擇手段，同時，爲了要促進革命，他犧牲了任何道德方面應予考慮的事項，默然接受親戚與往日同志的毀滅。但他也是一個有原則的人，並且同樣樂于爲革命而去犧牲他自己的生命。最後，他對自己那套共產主義的構想的忠誠却使他無法適應新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新的掌權人物竟然跟老的掌權人物同樣專制跋扈與毫無操守。在最後一頁，作爲一個「反革命」而面對處決時，他才體會到他一直在追求的原是一個幻想。

「重陽」中的共黨角色柳少樵，是個比方祥千來

得年輕的人，而且是被一些稍微不同的原因所策勵的。他所憎恨的倒不是金錢的力量，而是傳統社會加于它成員身上的社會桎梏。他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同時，他的個人主義又優先于他跟共產黨的交往。他決心爭取自由，而且要使別人跟他一樣自由，不管他們要不要。

柳少樵在厭棄並侮辱了他父親爲他挑選的妻子以後，就愛上了她的丫頭，當他得知那個丫頭也是一個强烈的個人主義者的時候。在他妻子設法投水以後，那個丫頭就責怪柳少樵，而他的回答則清楚地闡明了他的態度：

「你這樣恨她，太狠心了。她實在是個好人。」

「我也並沒有說她是個壞人。我祇恨她所代表的那種傳統和社會。任人宰割，甘作犧牲，竟一點不反抗。不反抗，就犧牲，那有什麼辦法？她要能像你，那就好了。」（見「重陽」第七九頁）

在下面的引文中，柳少樵說明他反對舊社會。他在對一個年輕女人說，爲什麼她的父親——他跟他的妻子已經分居多年——必須跟她的母親離婚，然後娶個寡婦。那個男人並不想離婚，而那個寡婦也希望依舊是個貞節的寡婦。但在柳少樵看來，他們兩個都是舊制度的俘虜，一定要强使他們自由。

「……這個制度已經實行了幾千年。但實行的結果，擺在我們面前，人人能夠看得見的事實是：少數又少數的特權人物擁有資金和土地，剝削大多數貧苦人民的勞力，坐享其成，窮奢極慾。那些被剝削的貧苦人民，則流汗流血，不獲一飽。而沒有一個特權人物的資金和土地，是用勞力換來的，他們來自剝奪，來自不正當的手段。這個制度保障專事剝奪的少數特權階級，這個制度是廣大貧苦人民的吸血鬼、催命符。除此之外，這個制度迫使多多少少的怨耦必須維持着他們的夫妻名義，終身痛苦，不許脫離。這個制度也限制無數相親相愛的青年男女，硬生生地分開他們，要他們心懸兩地，永受相思之苦！……」

「也許你說得對。」錢守玉打斷柳少樵的話說，「但你們使用了以暴易暴的方法，變是變了，問題並沒有解決。譬如我的爸爸和媽媽，他們自己何嘗願意離婚來？你們逼着他們，豈不反而造成他們的痛苦？」

「他們不願意，正是多年來因襲的結果，是非不明了。他們處在一種昏迷狀態之中，是非常可憐的。我們的第一個責任是要他們醒覺。」（見「重陽」第四三九

頁）

把革除舊俗的要求推展到可怕的極端，柳少樵建議他的一個信徒藉强奸他的母親和妹妹而把她們從傳統的貞節觀念中解放出來。但那個信徒却無法如他所說的做得那麼絕，于是，柳少樵就親自把她們兩個都奸污了。

方祥千和柳少樵雖都憎恨舊社會，但他們兩個對革命的看法却各不相同。就方祥千來說，革命意味着犧牲：革命者爲革命而犧牲自己。就柳少樵來說，革命意味着從一切社會束縛中解放出來。

每一類型都有少許例子。在「旋風」中，方祥千的小型共產集團中的人物之一是尹盡美，一個縱然患了肺病却不肯求醫的布爾塞維克。作者對他的評語是：

> 所以嚴格分析起來，尹盡美這個布爾塞維克，是有着濃厚的浪漫氣息的。他以小資產階級的悲觀主義，尋求刺激，消磨生命，無異把革命流血當鴉片烟抽。早期的共產黨人，像這樣的不在少數，尹盡美僅其一例而已。（見「旋風」第三七頁）

跟這完全相反的類型是張嘉，一個心地卑劣的詩人，他企圖藉勸導一個女孩說是性緘默乃是政治落後的眞憑實據而去誘姦她。

> 「蓮，你不能再猶豫了。現在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這是有史以來最偉大最劇烈的變動的時代。在這個變局中，跟得上去的便跟上去了，跟不上去的便被刷下來，歸于淘汰。我們應當有進步的理想，追求進步的生活。」（見「旋風」第四三八頁）

作爲一個諷刺小說家，姜貴對他大多數的人物——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員一視同仁——的自欺與自負加以調侃。但他也說明了共產主義的强烈的吸引力。下面的一幕揭露了武漢婦女軍政學校學生間的羣衆心理與革命熱：

> 「你的奶子這樣大了，怎麼還不束胸？」
>
> 「束胸？」光着上身的學生反問道，「你怎麼還不纏脚？」
>
> 「纏脚戕害身體，那不一樣。」
>
> 「難道束胸對身體有益？」
>
> 她把衣服穿好，捞起袖子來，大聲叫道：
>
> 「束胸是封建落伍的！我提議，我們隊上要解放束

胸。一個一個打開來看，從她開始！」

她手指着剛才說她還不束胸的那個學生。大家一陣嘍囉，一窩風把那個學生包圍，七手八脚，剝去了她的上身，把那件束胸用的緊身馬甲撕得片片碎，那學生捧着臉哭了。

「收起你的眼淚來！」

另一個學生就指責她。

「我們革命，要流汗、流血，不要流眼淚！」

「流眼淚是弱者！」

「是林黛玉！」

「是姨太太！」

「是娼妓！」

「是反革命！」

「打倒反革命呀！」（見「重陽」第三四六—三四七頁）

這時，那個指導員，一個叫做錢守玉的年輕女人就走進來了，勸導那些學生應該由辯論而不該恃暴力去解決困難。但她馬上成了羣衆的新靶子：

「指導員不革命！」

不知是哪個學生這樣一叫，大家又鬨起來。

「指導員不革命。」

「指導員反革命！」

「打倒不革命！」

「打倒反革命！」

「打倒指導員！」

「打倒錢守玉！」

「打倒反革命的錢守玉！」（見「重陽」第三四八頁）

那些沒有被共產主義吸引的人又是怎樣呢？姜貴的大部份人物畢竟都是一些沒有政治色彩的人，他們祇求別人不去打擾他們。玆姑就那些對于政治眞正抱有見解的人們中間的若干觀點加以說明。

假如允許我挑選的話，「旋風」中的文人方通三乃是不愛政治的。用他自己的話語：

「……我看寧可殺下幾條人命，倒還可以想辦法打官司，祇有牽涉到政治，就永遠跳入黃河洗不清了。你或許知道，我是從小就不喜歡政治的，我總覺得這不是我們這種人幹的事情。我現在親眼看看這種鬪爭的情形，對于政治是更加厭惡了。有人說，政治就是黑暗，我想是不錯的。」（見「旋風」第三〇四頁）

可是，正如方祥千指出的，方通三的態度也代表着一種政治選擇。

另一種是由錢本三來代表，他是「重陽」中的一個角色，作爲國民黨的一個間諜，在一九二六年跟共產黨徒一起工作，意在幫助革命軍奪取武漢。錢本三是個中年人，聰明，但却相當自命不凡、裝腔作勢。他的那種不要被人認爲「落伍」的濃厚的强制力——一種導使許多年輕人加入共黨的强制力，根據作者的觀察——原可以把他吸引到共產主義那一邊的。但他曾在十月革命的飢荒時期訪問過蘇聯，不相信中國人民甘于作如此重大的犧牲。他之站在國民黨一邊，是因爲他相信它會勝利。不過，在錢本三看來，革命不是一種犯罪而是一種事業。在一九二七年服務于武漢政府時，他讓自己被共黨所利用，因爲他深信他能够用謀略取勝他們。他的弱點是，由于他不願爲任何原因犧牲自己，所以他低估了共產黨徒鼓動別人犧牲的能力。在姜貴的構想中，錢本三似是代表那些低估共產主義力量的人，而且相信他們能够利用它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在另一方面，朱廣濟這個人物却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革命信徒。朱廣濟的革命經歷要追溯到同盟會時代，他要比錢本三更了解共產主義的危險。但在武漢他原可以跟錢本三合作來對抗共產黨徒的，因爲兩人都是在武漢的國民黨官員，但他却讓自己跟錢本三作個人的競爭，同時，他的畛域主義（朱來自湖北，而錢則是北方人）也妨碍了他們的合作。

在「重陽」快要結束時，朱廣濟獨個兒在先前的軍政學校裡行走。這是一九二七年的夏天，清共的行動業已展開，而共產黨徒也已逃到江西去。朱廣濟看見一個約莫十二、三歲的不良于行的孩子，他的一隻爛腿使他無法跟其他的共產黨徒一同逃走。他驕傲地告訴朱廣濟以他的新姓名，這是共產黨徒給他取的。原先是李達志，他已變成了「列打資」。「列」代表「列甯」，而「打資」則代表「打倒資本主義」的縮寫。他是徹頭徹尾地給口號標語灌滿了。列打資是一九二六年革命熱的一個悲慘的附筆（postscript），同時，他也是一個未來的表徵。

在「旋風」中，姜貴對共產主義的主要批判是借方天茂之口說出來的。天茂是方祥千的姪子，從小就給送到蘇聯去。他受了十年訓練，在西伯利亞的蘇聯

砲兵隊裡服過役，理應成爲一個頑强的共產黨徒的。方祥千曾對天茂寄予很大的期望，可是當天茂一回到中國就投効官府時，他沮喪了。方祥千訓斥他：

「不想你從小受訓練，還克服不掉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你說的這一切，全是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在作怪！」

「我不這樣想，六伯，」方天茂坦白地表示他的意見，「我以為這是現實。現實的力量比什麼都大，現實是能夠戰勝一切的。你老人家幹共產黨，是離開現實的。你所憑的祇是一種理想。像修仙的人學着打坐辟穀一樣，為了一種永遠不能實現的想像去吃苦，實在是沒有意義的。」（見「旋風」第三七六頁）

正如方祥千用來跟它相比的旋風，它具有可怖的摧毀力，但它的持續時間，用歷史的用語來說，將很短暫。

概括地說，姜貴的主題反映出他作爲二十世紀中國的一位藝術家和編年史家的見解。他知道過去以及它的傳統，雖然承認它的一些沉悶面，却仍堅持它的某些價值，例如孝道，應該給保存下來。他知道中國在內憂外患下的苦難，但却認爲在人類的歷史中，共產主義乃是一種落後的運動而不是一種進步的運動。而尤其重要的是，他的小說描述了那些由時間所造成的變化，並且堅信中國人民的持久活力。

（註）：本文作者羅體模（Timothy A. Ross，羅體模是他自己取的中文姓名），美國人，現任阿肯薩斯州立大學副教授，以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愛荷華。一九五七年入愛荷華大學就讀，一九五九年，開始學習中文並選修中國文化暨歷史等課程，一九六一年得學士學位。一九六二年秋，入愛大研究院，專治遠東史，翌年二月，獲碩士學位。一九六四年，曾携眷前來臺灣進修中文一年。一九七二年，以「姜貴：一位當代中國作家」（Chiang Kuei: A Chinese Writer in His Time）一篇論文獲得愛大博士學位。在論文尚未完成之前，羅先生即應「杜尼全球作家叢書」（Twayne World Authors Series）的編者之請，撰寫「姜貴」（*Chiang Kuei*）乙書，該書業于去年脫稿，不日將由「杜尼

中外文學

六月號・詩專號

姚一葦　論瘂弦的「坤伶」
陳芳明　檢討民國六十二年的詩評
顏元叔　認知與詩創作
楊牧　林冲夜奔
楊牧　致余光中的書簡
余光中　虎年
張健　繼續向前走
——爲中國現代詩再生進一言
張健　雷峯塔下
凝凝　重談「橫的移植和縱的繼承」
翁文嫻　看那手執五朵蓮花的童子
——讀周夢蝶詩集「還魂草」
辛鬱　柔性的戰歌

每册23元，社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劃撥一七九六五號顏元叔帳戶

出版公司」（Twayne Publishers）刊行。他所譯的「旋風」（*The Whirlwind*，全譯本）亦將由「中文研究資料中心」（The 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出版。本文係羅先生在本年四月一日美國麻州波士頓舉行的亞洲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第二十六屆年會「臺灣文學討論小組」（Panel on Literature in Taiwan）中宣讀的論文——原名 Themes in Chiang Kuei's Fiction。譯文因匆促付印，不克寄請羅先生親自校閱，至以爲憾，倘有謬誤，當由譯者負其全責。又，譯者沒有「突圍」一書（連原作者姜貴兄亦無存書），文中所有該書引句，均係依據英文逐譯，故容與原著略有出入，特此註明。